

赣南乡村地区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外来移民运动与土地开发、村落扩展的历史发展过程^①，至土地革命前夕，赣南乡村地区的聚落格局与社会构成大体成形。20世纪80年代编纂的赣南各县市地名志，其中关于各地自然村庄建设状况的内容（包括建村姓氏及其来源、建村时间、村庄地理位置等），尤其是详尽的村落分布地图，为我们了解土地革命前赣南乡村聚落形态和空间格局提供了最直接的线索和最直观的场景。

根据表 10-1 对赣南 15 县市历史上所建自然村数目的粗略统计，可见赣南现存的自然村庄，九成以上是在民国以前建立的，而且绝大部分又是在明清两代建立的。也就是说，在土地革命前夕，赣南各地的村庄大多已经建立，乡村聚落格局大体形成。

赣南乡村地区的聚落形态，从空间构造来看，大致可以分为集镇和散村两大类型。所谓集镇，就是指数个以上的自然村集聚在一个共同的聚落空间里，形成一个村落集群，通常称作片村。其中有的集村（片村）就是单一的一个姓氏宗族聚居其间，形成“聚族而居”的聚居聚落；也有的是好几个姓氏宗族杂居其间，形成杂居聚落。所谓散村，则是指零星小户散居各地、呈点状分布的零星村庄。因此，结合聚落的社会构成来看，赣南乡村地区的聚落形态又可具体区分为聚居聚落、杂居聚落与散村聚落三种类型。这三种聚落形态的具体分布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开发历史具有密切的关系，以下试分类说明。

^① 参见拙文《明代赣南的移民运动及其分布特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明清时期华南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清代山区农业经济的转型与困境：以赣南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从“寇乱”到“佃变”：明清时期赣南社会动乱年表的制作与初步分析》，载《厦大史学》第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180页。

第十章 土地革命前夕赣南乡村的聚落形态 与社区关系

土地革命时期，赣南是中央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赣南土地革命的发生发展，既是共产党人阶级革命推动的结果，同时也深受赣南本地历史上所形成的社会生态结构的规定和制约。关于前者，中共党史和苏区革命史的有关研究已经作了清楚的说明；关于后者则尚需阐明。本章试图从区域历史地理和乡村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土地革命前夕赣南乡村地区的聚落形态与空间格局，分析乡村社会认同的基本特征与地方政治派系的社会构成，揭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乡村地区复杂的聚落格局与社区关系，希望有助于深化对赣南土地革命之历史背景的认识。

一、聚落形态与空间格局

赣南地区即今赣州市辖区，下辖赣州市市区（章贡区）、赣县、兴国、于都、瑞金、宁都、石城、会昌、信丰、安远、寻乌、龙南、定南、全南、南康、大余、上犹、崇义等18县市。明清以来，

表 10-1 不同历史时期赣南 15 县市自然村建村数目 单位: 个

时期	宋以前 (960—1368年)	宋元时期 (1368—1644年)	明代 (1644—1911年)	清代 (1912年以后)	民国以后 (1912年以后)	总计
村庄 数目	160	1328	8612	28647	3420	42957
百分比 (%)	0.4	3.1	20.0	66.7	8.0	100
每十年 平均数	/	32.6	312.0	1072.9	/	/

资料来源: (1) 信丰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信丰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7年。(2) 崇义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崇义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4年。(3) 石城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石城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4) 瑞金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瑞金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5) 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6) 会昌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会昌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7) 安远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安远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8) 定南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定南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9) 龙南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龙南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6年。(10) 南康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南康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4年。(11) 上犹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上犹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12) 兴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兴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13) 于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于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14) 赣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赣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15) 赣州市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赣州市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8年。

说明: (1) 本表为完全统计, 包括开基村(或称“母村”)和分迁村(或称“子村”)等所有存在的自然村。(2) 本表“建村时间”一般情况是根据移民从迁居建村到 1985 年前后修地名志时的代数估算出来的大概时间, 一般以 25 年为一代。有的村庄指明了具体的朝代年号, 如“成化”、“嘉靖”、“万历”、“顺治”、“康熙”、“乾隆”, 或大概的时间, 如“明初”、“明中叶”、“清末”、“清初”、“清末”等, 则列入相应时间段, 而不依代数。本章以下各表情况除特别说明外, 均与此相同。

(一) 聚居聚落

聚居聚落通常分布在那些开发较早、地理环境相对优越的河谷开阔地带, 或坐落于山间盆地之中。如在于都县北部赖村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属宁都县)青塘河流域, “聚族而居”的集

村聚落形态特征十分明显。从总体的地理形势上讲, 该乡西北部地势较高, 青塘河自北向南纵贯全乡, 河流两岸地势平坦, 沿途接纳了十来条支流。全乡山地约占 1/3, 丘陵与河谷平地约占 2/3。从宁都县地名志的记载及地名图可见, 本乡大部分村庄分布在青塘河及其支流的沿岸地带, 其中以温、肖、黄、宋四大姓村庄为主。^①这四姓村庄在空间分布上相对独立而集中, 形成四大块“聚族而居”的聚居聚落。根据《宁都县赖村乡地名图》^②和地名志中关于四姓村庄迁建时间的记载整理成表 10-2、表 10-3、表 10-4、表 10-5, 从中可知其大致状况。

温姓村庄集中在赖村乡东部的陂田、虎井一带(即为两个行政村), 这里丘陵起伏, 溪水交错。据说, 温姓大约在唐天宝年间(742—755年)从虔化县城(今宁都县城)迁此开基立居。截至土地革命前, 这里共有 23 个温氏村庄, 构成温氏“聚族而居”的聚居聚落。

表 10-2 宁都县赖村乡温氏聚落构成

村庄迁建时间	村庄名称及基本情况
始迁村(计 1 个)	虎井(唐天宝年间, 温如珪从虔化县城迁居/89/606)
明以前(计 1 个)	上村(天宝/25/148)
明代(计 5 个)	陂田(弘治/38/220)、小儿口(隆庆/6/27)、巷背(万历/9/48)、其头(天启/10/60)、中坑垄(崇祯/24/128)
至今 8—13 代(计 6 个)	茨皮坑(顺治/3/23)、苏村(康熙/6/78)、下溪(康熙/14/83)、罗坊(康熙/10/72)、牛屎坪(乾隆/5/24)、旱塘坑(乾隆/5/29)

^① 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 第 245—262 页。

^② 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 第 244 页。

续表

村庄迁建时间	村庄名称及基本情况
至今 6~7 代 (计 5 个)	山子底 (嘉庆/1/6)、油店底 (道光/1/10)、则牙坪 (道光/2/21)、岭背 (6/2/6)、安坑 (清中期/2/21)
至今 5 代以下 (计 5 个)	霜江排 (5/5/26)、径尾 (同治/12/72)、径口 (同治/14/113) 谷溪村 (宣统/5/35)、大狼寨 (清末/2/10)
合计	23 村

资料来源：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 年，第 245~262 页。

说明：村庄后面括弧中的文字或数字依次是迁居至今的代数或具体建村时间，20 世纪 80 年代地名志编纂时的户数和口数。以下各表均与此相同。

肖姓村庄集中在赖村乡西南部的新民、石街两个行政村境内，其中石街四面环山，中间呈盆地状；新民东、西丘陵环绕，中间较平坦。这一带共有 36 个肖姓村庄，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祖先大约是在南宋绍兴年间 (1131—1162 年) 从宁都县肖田迁居新民樟树村开基立居的。

表 10-3 宁都县赖村乡肖氏聚落构成

村庄迁建时间	村庄名称及基本情况
始迁村 (计 1 个)	樟树 (南宋绍兴年间，肖二八从宁都县肖田迁居此地/31/185)
至今 26~28 代 (计 4 个)	枫锣丘 (28/54/288)、高布脑 (28/27/171)、岭下 (至正/3/18)、南山下 (至正/35/206)
至今 17~24 代 (计 9 个)	留田 (洪武/28/147)、金鸡坑 (永乐/1/12)、寨下 (天顺/38/224)、布下 (天顺/35/203) 牛牯寨 (20/2/12)、对面排 (19/27/162)、棋盘圩 (19/7/42)、长家岭 (18/31/163)、庙背 (17/16/93)

续表

村庄迁建时间	村庄名称及基本情况
至今 14~16 代 (计 3 个)	王碑石 (万历/23/118)、径背 (万历/13/80)、长坑尾 (15/1/8)
至今 11~13 代 (计 6 个)	田坑 (13/35/196)、桃树坑 (12/11/74)、罗坑 (12/26/162)、湖坑墩 (11/5/37)、田西 (11/26/195)、下坝 (11/14/87)
至今 8~10 代 (计 10 个)	石街下 (10/45/288)、人形窝 (10/12/70)、黄泥窝 (10/3/17)、猫石下 (10/19/103)、香花寨 (10/2/14)、桐树坑 (10/2/12)、银坑山 (10/27/157)、螃蟹 (10/15/86)、乌里 (10/16/91)、土围 (9/28/262)
至今 7 代以下 (计 3 个)	鹅公坳 (6/2/10)、下坑 (6/1/3)、山泥湖 (5/1/6)
合计	36 个

资料来源：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 年，第 245~262 页。

黄姓村庄则主要分布在赖村乡西南部的围足、水西和南部的浮竹，以及东南部的蒙坊等行政村境内，这里主要位于赖村乡主干河流青塘河的东、西两岸，河流沿岸地势平坦，远离河岸为丘陵岗地。据载，聚居在这一带的 60 个黄姓村庄，分别由黄永忠和黄松隐这两个开基祖繁衍而来，他们都是来源于宁都县田头乡横山。其中黄永忠大约是在南宋绍兴五年 (1194 年) 迁居在赖村乡永山开基建村的，后来衍为 52 个村庄；黄松隐则是于南宋开禧年间 (1205—1207 年) 迁居在赖村乡上浮竹开基建村的，后来属于这一支的只有 8 个村庄。

表 10-4

宁都县赖村乡黄氏聚落构成

村庄迁建时间	村庄名称及基本情况
始迁村 (计 1 个)	永山 (南宋绍熙五年, 黄永忠从宁都田头乡瓊山迁居此地/33/172)
明以前 (计 3 个)	东塘 (开禧/49/297)、水西 (嘉定/112/702)、园田 (26/26/163)
至今 17~24 代 (计 14 个)	下浮竹 (洪武/43/239)、山径 (洪武/25/144)、围足下 (21/35/175)、大径里 (景泰/25/150)、大山下 (19/15/96)、陈岭排 (19/20/109)、牛角丘 (19/11/71)、八字圩 (19/67/365)、圆头坪 (18/6/32)、南山下 (18/12/74)、大小排 (18/10/84)、虎爪排 (18/5/34)、铁炉排 (18/12/127)、石山岭下 (17/8/54)
至今 14~16 代 (计 7 个)	桥头 (16/19/122)、坵上 (万历/68/432)、山坝 (天启/11/58)、牙前坝 (明后期/1/10)、岐上 (14/15/85)、坝里 (14/38/132) 等
至今 11~13 代 (计 14 个)	坪脑 (13/119/623)、分墩 (13/7/35)、大古营 (12/9/57)、张塘 (12/22/84)、象湾里 (12/7/57)、张公嘴 (12/28/108)、排脑 (12/42/246)、塘窝 (12/10/42)、银定圩 (12/15/94)、公王下 (12/6/66)、新圩 (12/22/146)、岭背 (12/13/81)、七树安 (12/1/8)、白泉 (11/9/42)
至今 8~10 代 (计 11 个)	土围里 (乾隆/33/202)、何包圩 (乾隆/25/98)、下排 (10/15/74)、冷水坑 (10/3/15)、松山排 (10/6/40)、簪坑 (10/10/54)、池坑 (9/9/46)、松山 (9/51/337)、下坪脑 (8/47/90)、新村 (8/10/60)、樟古龙 (8/8/41)
至今 7 代以下 (计 2 个)	老屋 (7/6/30)、坳背 (6/2/18)
合计	52 村

永山黄氏

续表

村庄迁建时间	村庄名称及基本情况
始迁村 (计 1 个)	上浮竹 (黄松隐于南宋开禧年间从宁都田头乡瓊山迁居/75/385)
至今 14~16 代 (计 2 个)	义工田 (16/15/90)、芙蓉 (崇祯/42/245)
至今 11~13 代 (计 2 个)	鹤记丫 (13/12/78)、杨梅墩 (13/5/29)
至今 8~10 代 (计 3 个)	大塘 (8/13/60)、合坑 (8/21/111)、泉水 (8/30/161)
合计	8 村
总计	60 村

资料来源: 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 《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 年, 第 245~262 页。

宋姓村庄主要分布在赖村乡中部和西北部的赖村、莲子、山坑等三个行政村, 这里西北面和东南面山石耸立, 整个地势由两面向中间倾斜, 青塘河从中间流过, 沿河两岸地势平坦。赖村乡过去的圩场即位于河岸边。据说, 赖村本为赖自耀于唐贞观年间 (627—649 年) 从虔化县城 (今宁都县城) 迁居开建, 原名赖水里, 后改为赖村 (即今赖村老街); 后来不知因为何故, 赖氏全部迁走, 现在赖村一带无一赖姓, 全是随后迁人的宋姓居民。^① 据民国三十七年赖村宋氏族裔人修纂的《零邑赖溪宋氏三修族谱》记载, 宋氏是在明成化元年 (1465 年) 迁居赖村的, 其时宋氏开基祖才备公携五子由吉安庐陵樟溪迁居于都北乡赖村。^② 至民国三十七年宋氏

① 参见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 《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 年, 第 246 页。

② 宋应桂: 《初修族谱跋》, 《零邑赖溪宋氏三修族谱》, 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年) 刻本。

三修族谱时,其丁口超过万数,成为于都北乡大族,如云:“(才备)公于明成化间携五子徙居于此,惟子忠公传六世外出无从根据,今赖溪聚族而居者,悉子温、子良、子恭、子贵四裔也。历世二十,历年四百有奇。谱凡三修……吾族四房八支,丁口逾万。”^①据地名志统计,聚居在这一带的宋氏村庄达50多个,足见其“聚族而居”的规模之大。

表 10-5 宁都县赖村乡宋氏聚落构成

村庄迁建时间	村庄名称及基本情况
至今 14 ~ 19 代 (计 4 个)	洋江坝 (嘉靖/38/203)、干里 (14/5/57)、张家墓 (14/14/86)、老圩 (明末/28/192)
至今 11 ~ 13 代 (计 13 个)	赖村老街 (清初/104/583)、新村 (13/57/307)、王田排 (12/6/32)、罗山下 (康熙/19/124)、安下 (康熙/15/116)、鹅丘 (11/8/47)、大屋里 (11/19/106)、坳背 (11/13/77)、碾心 (11/8/53)、画眉塘 (11/15/88)、龙吐珠 (11/24/178)、小布坳 (11/22/124)、山田尾 (11/8/50)
至今 8 ~ 10 代 (计 16 个)	垆弦背 (10/12/84)、木石背 (10/5/45)、龙头 (10/23/113)、英布 (9/13/77)、莲子塘 (9/49/305)、将军排 (9/19/126)、排子上 (9/11/66)、陈坎 (乾隆/16/66)、松山下 (乾隆/5/35)、高排 (乾隆/22/114)、九里径 (乾隆/14/87)、河背 (8/14/112)、马牯拍 (8/9/45)、大坝底 (8/18/133)、葛坑里 (8/21/138)、路江排 (8/16/108)

^① 宋景相:《三修族谱跋》,《雩邑赖溪宋氏三修族谱》。清初以来,宋氏就已经是于都望族,具有很高的声望,如自宋应桂中武进士以来,宋氏在科名、文学等方面表现出蒸蒸日上之势,在于都县流传下来的宋至清代的61部文集,宋氏文集就有15部,约占25%。

续表

村庄迁建时间	村庄名称及基本情况
至今 6 ~ 7 代 (计 20 个)	桃树排 (7/11/60)、中布 (7/10/55)、王村 (嘉庆/60/334)、大马石 (嘉庆/51/296)、下罗 (嘉庆/31/191)、荷树下 (嘉庆/24/100)、狮石下 (嘉庆/8/48)、洋石碣 (嘉庆/28/160)、黄土岭下 (道光/32/167)、里马坎 (道光/10/80)、金钟 (道光/13/66)、圩头 (道光/75/417)、上排下 (道光/104/529)、大马岭脑 (道光/15/97)、古寺排 (道光/21/137)、马尾石 (道光/9/59)、清水潭 (道光/35/203)、下排下 (嘉庆/36/153)、旱坝 (道光/20/113)、高真排 (清中期/9/50)
至今 5 代 以下 (计 5 个)	木山下 (5/5/31)、海罗背 (5/11/56)、排脑 (5/8/50)、上圳排 (同治/10/57)、磨岭下 (4/13/44)
合 计	58 村

资料来源: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年,第245~262页。

由上可见,于都县北部赖村乡的肖、温、黄、宋四姓的聚居聚落,都分布在自然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青塘河及其支流沿岸的河谷地带和丘陵岗地,他们最迟在明前期就已经在此开基立居。这一点是赣南北部诸县“聚族而居”聚居聚落的共同特点,同时也是赣南北部诸县早期开发的历史特点。^①

在赣南南部及东南部山区诸县狭长的河谷地带或山间盆地,乡村聚落形态亦主要表现为“聚族而居”的聚居聚落。由于这些地区的山地面积占更大的比重,山区环境特征突出,与北部较为开阔的大盆地或河谷平原相比,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中适合人群居住的河谷地带和山间盆地,主要挤压在狭小的山地峡谷之间,居民聚居

^① 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历史系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7~27页。

的空间聚落相对封闭和狭小。受此山区地理环境的影响,南部及东南部地区聚落的聚落形态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从南部各县地名图可见,南部及东南部山区大小不一的聚居聚落,通常坐落在狭长的河谷地带或封闭的山间盆地中。如《龙南县南亨公社地名图》^①及表 10-6 所示,在龙南县南亨公社境内,大部分地方属于山地,是典型的山区,南亨河自南而北流经全境,该乡村庄集中在河流沿岸狭长的河谷地带,由此形成相对独立的几个大小不一的聚居聚落。^②其中在南亨河的上游,分布着三个叶姓“聚族而居”的聚居聚落,当地分别称之为“驼背树下”、“湾仔”、“塘石”片村。据地名志记载,这三个片村都是明代中叶从附近的武当公社迁居而来的叶氏建立的。在南亨河的中游,地势相对开阔,河流的两岸有两个片村聚居聚落,即东岸的东村与西村。其中东村主要是陈姓的聚居点,此外还有两个外族村庄,即黄姓的岗上村和从本县桃江迁来的陈姓建立的芦湖塘村。据说东村陈姓大概是在明初从福建漳州迁居到这里开建村的。西岸的西村主要是刘姓的居住点,大约明万历年间,刘福隆从定南县三亭迁居这里开建村,随后刘氏沿着南亨河岸迁建立了数个村庄,形成俗名“西村”的片村聚落。在南亨河的下游沿岸一带,分布着十来个赖氏村庄,它们都是由元末明初从附近临江大屋迁居过来的赖氏建立的,形成俗名“圭湖”的片村聚落。除了在南亨河沿岸分布着上述“聚族而居”的集村聚落后,在公社西部的南亨河小坑里,也分布着一个人少村小的聚居聚落,即张姓聚居的“高乾”片村。张姓大约在明前期从附近的临江公社塘口村迁居这里开建村的。

① 龙南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龙南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6年,第122页。

② “南亨”之名即源于其地处县治南部的河坑里而得“南坑”,后因在当地方言里,“坑”、“亨”两字同音,为取“亨利通达”之意而称南亨。参见龙南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龙南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6年,第123~131页。

表 10-6 龙南县南亨公社聚居聚落状况

聚落名称	建村姓氏	建村时间	姓氏来源	村庄构成
驼背树下	叶	明代中叶	本县武当大垌	老屋仔 (17/43/239)、松树排 (13/17/89)、新屋下 (12/47/241)
湾仔	叶	明代中叶	本县武当大垌	围仔 (17/30/180)、郭车尾 (16/33/198)、湾仔 (14/71/450)
塘石	叶	明代中叶	本县武当北辰	老屋仔 (17/14/68)、围仔 (11/25/137)、新屋仔 (8/11/76)
东村	陈	明初	福建漳州	老屋下 (24/32/185)、蕉村 (22/5/21)、沙园围 (20/118/624)、长兴围 (20/48/262)、石笋石 (20/46/240)、竹头屋 (18/17/116, 该村在河的西岸)、茶头树下 (16/28/161)
西村	刘	万历年间	定南县三亭	老屋仔 (万历/56/274)、新围仔 (12/141/749)、杜弯子 (10/24/140)、秤钩弯 (10/10/67)、新屋仔 (10/52/254)
圭湖	赖	元末明初	本县临江大屋	东风 (27/26/157)、腰带水 (26/?/?)、樟树头下 (26/24/124)、水坑 (24/11/75)、大石古 (21/12/65)、凤凰朝 (20/9/53)、马朝 (20/9/49)、菱坑 (17/26/156)、水鼓面 (17/14/82)、新屋下 (12/84/427)、藕溪头 (11/52/275)、围仔 (5/2/10)、社官背 (4/5/31)
高乾	张	明代前期	本县临江塘口	祠堂下 (20/19/95)、龙仔头 (14/13/91)、排上 (14/19/97)、河背 (11/10/65)、流陂 (3/6/33)

资料来源:龙南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龙南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6年,第123~131页。

南部及东南部山区典型的“聚族而居”的聚居聚落,除了与

们建立的村庄总计 17 个,差不多就是一族一村,这些村庄在空间分布上大多散落在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山脚下或坑窝里,如雷姓于明万历年间迁居建立的龙下村,“在田埠北面 3.5 公里龙形脚下的坑窝中”^①。大体而言,这些明末清初以来迁居建立的外来移民村庄表现为点状分布的散居村落。

表 10-7 明末清初宁都县田埠乡外来移民村庄迁建状况

村庄名称	建村姓氏	建村时间	姓氏来源	户数	口数
寨下	连	至今 19 代	福建宁化	39	210
甘家地	甘	至今 18 代	福建	15	84
东山下	谢	嘉靖七年	福建宁化	13	73
龙下	雷	万历	福建宁化	62	337
竹森下	同上	至今 14 代	福建宁化	33	166
吉龙坑	邱	崇禎	福建建宁	26	115
罗家斜	唐	崇禎十三年	福建建宁	15	63
罗家排	同上	崇禎十三年	福建建宁	11	73
上寨	吴	至今 14 代	福建	11	53
乌石龙	曾	顺治十六年	福建宁化	4	20
花树下	余	至今 13 代	福建宁化	4	21
官齐坑	湛	康熙	福建宁化	30	150
麻斜背	张	至今 12 代	福建宁化	3	12
排上	饶	至今 11 年	福建建宁	5	39

① 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 年,第 221 页。

这些地区突出的山区环境特征密切相关外,也深刻地受到明代这些地区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在明代赣南南部及东南部地区,频繁的“寇乱”迫使当地居民筑建围寨军事堡垒进行“聚族自保”,其结果形成“聚族而居”的聚居聚落^①,如在上述龙南县南亭一带的大小聚居聚落中,不少村庄就直接命名为“围仔”或“某某围”,这既是当地聚居聚落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说明这些聚居聚落与当地的历史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

(二) 散居聚落

在土地革命前赣南乡村地区实际的聚落空间格局中,除了上述单一姓氏宗族聚居的集村或片村聚落外,也广泛存在零星散户建立的呈点状分布的散居或插居村庄。即使上述聚居聚落也不完全是纯一色的同姓同宗村庄,譬如在于都县赖村乡四大姓的聚居聚落中,也夹杂着少数的异姓村庄,如白窑(谭/本乡高岭/9/15/120)、大古潭(肖/本乡水西/明初/10/60)、王欧里(王、欧/乐安/11/7/16)、长坑(李/宁都石上/9/6/34)、社前排(陈/瑞金瑞林/10/18/113)、赖屋岐(刘/石城县长乐/万历/51/313)、鹅形(潘/宁都/5/3/14)、石前(林/广东平远/万历/31/213)、塘下(廖/宁都黄陂/12/29/183)等村。^②这些零星小户的村庄,大多是明末清初以来的外来移民插居其间建立的。在明末清初以来外来移民特别活跃的赣南北部及西部等一些地区,这种散居或插居式的村落形态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宁都县田埠乡地名图》^③和表 10-7 所示,在宁都县田埠乡(明清时期属宁都县下三乡之一的仁义乡)境内,来自福建地区的 15 族外来移民大多是在明末清初迁居此地的,他

① 参见饶伟新《明清时期华南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史学月刊》2003 年第 12 期。

② 这些村庄后面括弧内的文字或数字依次是建村姓氏、来源地、建村时间、20 世纪 80 年代的户数和口数。

③ 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 年,第 218 页。

里,而南距田埠十五里,西距马头十里,则皆仁义乡也。其形势高峰四面攒簇,中成村落,面临塘池数十区,村分东西二排,有小涧二:一从东南溯流而西;一从北溯流而南,而江归子西。东有古隘,有将军庙,有博济庙;西北有凌霄阁;西有兴龙桥,有妙觉庵;南有永东寺;西南有二大土围;村之中则有大小宗祠,有书院,有乡约所,有龙城会馆;计田千百十亩,塘大小百十口,所居户千百十户,口千百十口,异姓附居者十户,口百十口。自韶州司户参军李翊俊翁太府君子宋乾德丁卯(967年)由石城半径徙居本里,历今二十七世,计年七百有奇,聚庐而处,皆公子孙。^①

由上可知,东龙李氏自北宋乾德五年(967年)开基祖李翊俊开基建村以来历经七百余年的发展,至清前期时就已经在东龙一带形成一个以布头自然村为中心的聚居聚落。清初的宁都县下乡是闽粤佃户特别集中的地区,也是“佃变”严重的地区。地处下乡的东龙李氏当时在村中建筑围屋和团练乡勇,以抵御“闽佃”有组织的集团性攻击,如李腾蛟所述:

庚寅(顺治七年)而后,庐舍焚毁,寇贼充斥,乃建守土之议,练乡勇数千百人,而推一人以统之,则有从征文止名彬者为为之倡,贼至辄与搏战,屢挫其锋,贼始不敢犯吾境,岂非捍御功哉?既东西二大土围,共相保聚,然后家室得完,其所以固吾圉者,亦既艰且口矣。^②

可见,明末清初以来闽粤佃户在宁都下乡的移垦以及随后广泛的

^① 李腾蛟:《里居志》,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三十一《艺文志》,(清)黄永纶等纂,道光四年(1824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9页。李腾蛟(1609—1668年),字咸斋,宁都东龙村人,清初“易堂九子”之一,著有《周易易言》、《诗文集》。

^② 李腾蛟:《里居志》,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三十一《艺文志》,第2589页。

续表

村庄名称	建村姓氏	建村时间	姓氏来源	户数	口数
沙波	陈	至今10代	福建建宁	14	32
炉灶坑	刘	至今10代	福建建宁	14	58
桐斜窝	廖	至今9代	福建	3	16
合计:17村	15族				

资料来源: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年,第219~234页。

说明:(1)表中建村姓氏如果属同一家族,则在“建村姓氏”和“建村来源”栏中只出现一次。(2)建村时间中数字为建村至今的代数,以25年为一代。(3)表中户口数为地名志编纂时的户数和口数。(4)“建村姓氏”栏中“同上”字样意为该村为上面村庄姓氏的分迁村。以下各表均与此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北宋年间就迁居在田埠乡东龙一带的李氏,其聚居的聚落与上述福建移民的散居村落并同一流域且形成鲜明的对比。如《宁都县田埠乡地名图》^①及表10-8所示,大概有26个李氏村庄集中在田埠乡东龙及周围一带,形成一个“聚族而居”的聚居聚落。东龙村位于田埠乡的东北部,因其东面群山起伏,形如卧龙,故称为东龙;这里四面低山环绕,北高南低,中间为平坦小盆地。清初宁都“易堂九子”之一的李腾蛟(1609—1668年)就出生在这里。关于其先祖的迁居历史以及至清初时东龙李氏聚居聚落的状况,李腾蛟曾在《里居志》中有详细的描述:

距邑治东七十里,为仁义乡之东龙,广二里,袤三里,地界石城,东距石城小松十里,北距石城桐冈十五里,东南距石城曾坊五里,东北距石城南桥头三里,西北距石城罗畚五

^① 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年,第218页。

“佃变”活动，对东龙李氏“聚族自保”的聚居状态有直接的影响。如《宁都县田埠乡地名图》^①所示，在土地革命前的田埠乡境内，福建移民的村庄大多散落在一些地理环境较偏僻的山脚下，而土著李氏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地理条件优越的东龙盆地以及境内主干河流的沿岸一带。实际上，李氏村落与福建移民村落之间在空间分布上的这一差异，就隐含着历史上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换言之，田埠乡境内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反映了其间的族群矛盾关系。

表 10-8 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李氏聚落构成

村庄迁建时间	村庄名称及基本情况
始迁村 (计 1 个)	布头 (北宋乾德五年李翊俊从石城半径迁居此地/30 户/142 口)
至今 26 ~ 30 代 (计 7 个)	高排 (30/36/157)、店下 (28/30/144)、西坑 (28/20/104)、背寮 (27/23/116)、自背 (27/4/21)、南坑 (26/17/99)、墩上 (26/24/119)
至今 14 ~ 22 代 (计 8 个)	小斜垄 (22/4/21)、桥头 (19/15/73)、螺背寮 (17/16/80)、罗泥坑 (16/2/10)、杉洞 (16/16/85)、坪樟口 (万历/24/145)、樟木上 (14/14/70)、南木桥 (崇祯/34/177)
至今 11 ~ 13 代 (计 8 个)	八十墩 (顺治/13/64)、王江下 (康熙/26/130)、祥和岭 (12/8/45)、鸡岭下 (11/3/12)、坳背 (11/2/10)、横排 (11/7/27)、王头 (11/8/48)、莫木坑 (10/15/84)
至今 5 ~ 7 代 (计 2 个)	珠坪 (7/9/53)、竹坝里 (5/9/45)
合计	26 村
异姓村庄	鱼陂 (陈姓/14/12/48)、排上 (陈姓/乾隆/13/64)

资料来源：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 年，第 219 ~ 234 页。

① 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 年，第 218 页。

明末清初以来，在那些大面积安插或招徕外地移民（主要是闽粤移民）垦佃的地区，由这些外来移民建立的散居村庄则呈现出相对密集而广泛的空间分布特征。上犹县西部营前一带的聚落形态和空间格局即具有这一特点。营前属于丘陵地形，南北高，中部低，营前河由平富河与石溪河汇合而成，由西向东穿过中间开阔的盆地，两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明末清初以来，大量的广东流移民由政府安插或招徕在这里垦荒辟地，并逐步定居下来。^①从《上犹县营前人民公社地名图》^②和表 10-9 可知，明末清初以来移居这里的广东移民有 50 族，建立的村庄有 72 个，平均一族只有 1.4 个村庄，其中除了梅口何氏、水南黄氏、桥头黄氏等族有建立始迁村之外的数个分迁村外，大部分的移民姓氏差不多只有一个始迁村而已，这表明大部分的广东移民都处于单姓单村的散居状态，未能形成“聚族而居”的聚居聚落。不过，在营前的一百来个自然村中，广东移民村庄（包括始迁村和分迁村）占据五成以上，表现出一定的密集和广泛程度。相反，早期土著居民的聚落空间发展却因此受到限制和挤压，如最早迁居营前的朱、陈、蔡、郑等所谓的“本地人”主要聚集在龙王（朱/豫章/南宋/82/437）、下陈（陈/泰和县/南宋/137/752）、营前城（蔡/吉水县/南宋/111/563）街（郑/福建/明初/107/493）、九秋（郑/坪子街/咸丰/111/563）等为数甚少的几个村庄。^③这一聚落空间格局在赣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明末清初以来，南康、赣县、于都、兴国等赣南中北部诸县一些乡村地区的闽粤移民经历了与上犹县营前广东移民类似的移居

① 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历史系 2002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66 ~ 74 页。

② 上犹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上犹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 年，第 102 页。

③ 上犹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上犹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 年，第 105 ~ 113 页。新修《上犹县志》(内部资料)，1992 年，第 88 页。罗勇：《上犹县营前镇的宗族社会与村落文化》，载《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8 年版，第 377 页。

过程(即安插或招垦)①,这些地区的聚落形态亦与上犹县营前地区具有类似的特征②。

表 10-9 明末清初上犹县营前公社外来移民村庄迁建状况

村庄名称	建村姓氏	建村时间	姓氏来源	户数	口数
大坳	蔡	崇祯九年	广东兴宁	27	174
坝岗	钟	崇祯	广东兴宁	49	251
竹山排	黎	顺治	广东梅县	42	201
邓屋	邓	顺治	广东兴宁	48	254
军田	曾	顺治十四年	广东兴宁	30	169
笠麻坑	何	顺治	广东兴宁	34	161
陶背	钟	顺治	广东兴宁	74	372
象牙湾	何	顺治	广东兴宁	93	491
田螺寨下	何	顺治	广东兴宁	44	247
梅口	何	顺治	广东兴宁	14	92
石灰窑下	同上	康熙	本地梅口	2	13
杉山子	同上	康熙	本地梅口	2	7
坎头庵	同上	康熙	本地梅口	17	77
上棚	同上	乾隆二十五年	本地梅口	9	45
桃子坑	同上	乾隆	本地梅口	9	48
下棚	同上	乾隆	本地梅口	31	138
作跋坑	同上	道光	本地梅口	3	18

① 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历史系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6~74页。

② 如在兴国县的长冈、江背,于都县的西郊等乡,闽粤移民村落既单姓单村,呈散居状态,又在整体上呈密集分布。参见兴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兴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年,第215~227、315~327页;于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于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年,第189~211页。

续表

村庄名称	建村姓氏	建村时间	姓氏来源	户数	口数
邹洞	戴	顺治	广东兴宁	15	79
大湾	同上	乾隆	本地邹洞	41	187
寨下	陈	顺治	长宁口	40	212
山下城	朱	顺治	广东和平	46	263
小坑	同上	乾隆	本地山下城	14	62
柯树坳	范	顺治	广东惠州	7	43
大船洞	蔡	康熙	广东兴宁	25	134
坳头顶	刘	康熙	广东龙川	30	159
洞仔	朱	康熙	广东和平	18	102
龙埂	黄	康熙	广东兴宁	12	52
高分头	同上	康熙	本地龙埂	22	108
欧坝	何	康熙	广东兴宁	76	409
庠斗垄	傅	康熙	广东兴宁	53	250
樟树村	赖	康熙	广东兴宁	134	708
山田背	张	康熙	广东长乐	86	437
耙头	刘	康熙	广东兴宁	29	150
长岭尾	黄	康熙	广东兴宁	32	189
崩河坎	陈	康熙	广东兴宁	42	235
长岭岗	黄	康熙	广东兴宁	49	179
竹山下	同上	道光	本地长岭岗	26	140
桥头	黄	康熙	上湾老屋	116	611
陶排	同上	至今13代	上湾老屋	76	148
花屋	同上	至今8代	上湾老屋	20	94
水南	黄	康熙二十九年	广东和平	38	182
竹山	同上	乾隆	本地水南	24	123

续表

村庄名称	建村姓氏	建村时间	姓氏来源	户数	口数
香炉	同上	乾隆	本地竹山	31	140
岗顶	同上	道光	本地水南	71	336
上坝	同上	光绪	本地竹山	49	220
社下	叶	康熙	广东兴宁	24	133
新坳	赖	康熙	广东和平	29	153
石古坝	李	康熙	广东兴宁	10	68
蜡树	黄	康熙	广东兴宁	20	108
黄泥洞	赖	康熙	广东和平	59	328
高樟下	同上	至今8代	本地黄泥洞	10	47
社窝子	张	康熙	广东兴宁	9	29
岭背	同上	乾隆	本地社窝子	12	60
一里坑	同上	光绪	本地社窝子	13	58
朱屋	朱	雍正	广东和平	16	80
后坑	曾	雍正	广东兴宁	37	213
高坑子	蓝	雍正	广东兴宁	5	29
蛇头湾	张	雍正	广东兴宁	18	95
上狗形	曾	雍正八年	广东兴宁	4	26
彭屋坑	彭	雍正	广东兴宁	28	143
松山下	李	乾隆	广东兴宁	6	23
蕉龙	邱	乾隆	广东兴宁	12	59
桃花洞	李	乾隆	广东兴宁	69	328
竹头	黄	乾隆	广东兴宁	23	123
湾子	同上	乾隆	本地竹头	27	148
蓝屋排	蓝	乾隆	广东兴宁	25	129
油槽下	张	乾隆	广东兴宁	6	25

续表

村庄名称	建村姓氏	建村时间	姓氏来源	户数	口数
牛岗肚	毛	乾隆	广东	5	26
三台岭	黄	嘉庆	广东兴宁	7	47
狮形	蓝	嘉庆	广东兴宁	26	144
山下	同上	至今8代	本地狮形	48	260
井子坳	陈	道光	广东程乡	?	?
合计: 72村	50族				

资料来源: 上犹县地名办公室编印: 《江西省上犹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 第103-113页。

明末清初以来, 闽粤移民的移垦定居活动, 深刻地影响了赣南东部、北部、中部和西部等乡村地区的聚落形态和空间格局。在这些地区, 闽粤移民可能是以个体移居和寄籍的方式定居当地的, 这往往形成移民散居或插居式村庄与土著聚居聚落并存的空间格局, 如宁都县田埠乡接近这一情形。在另外一些地区, 闽粤移民是以大规模的、集团性的方式流聚和集中安置在当地的, 这就导致移民村庄的密集分布, 还往往挤压了土著聚落的发展空间, 如上犹县营前一带接近这一情形。无论何种情形, 都表明土地革命前赣南乡村聚落形态和空间格局的多元复杂性, 与明末清初以来外来移民的移居历史过程有着密切的关联。

(三) 杂居聚落

其实, 在赣南乡村地区许多地理位置相对开阔、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河谷平原或山间大盆地里, 由于历史上不断有移民进入开基建村, 往往使得这一聚落空间形成杂居的格局。这种情形在赣南中北部的大河沿岸地带比较普遍, 如于都县梓山境内的片村聚落就具有典型的杂居特征。

表 10-10 于都县梓山公社各村概况

片村名称	所属大队	概 况	聚落类型
1. 岔口	梓山	包括上陈屋、中陈屋两个自然村，地处贡水河岸三岔路口。明朝，陈氏从福建武平迁入，同时何氏从福建将乐迁入	杂居
2. 荷莲山	梓山	包括曾屋、郭屋、竹沙下三个自然村。清朝，曾氏从秦和迁入	聚居
3. 火烧塘	塘贯	包括上、下三贯，东片，内坪，溪背等自然村。宋代，刘、朱两姓从万安至此立基	聚居、杂居
4. 田心	塘贯	含大山里、排上、田心等自然村。宋末，朱氏从万安迁入	聚居
5. 长源	源枫	包括栏杆前、水口、沙塘背、荷树背、林屋、上塘坂、石排、井头坑、小山安、鲁坑尾等自然村，因村中小溪源远流长，故名。明代，肖、方二姓从本县仙下迁入，邹氏从本县岭背迁入，钟、胡、李、林、谢、刘、易等姓于清初相继迁入	杂居
6. 长口	长口	包括龙坳、石人排、大巷里、石坂岭等村。明末，赖氏从福建迁入；清初，肖、程、赖、何等姓相继迁入	杂居
7. 竹山下	大陂	包括新店、竹山下、坳上、水库等自然村。明末，朱氏从田心迁入	聚居
8. 山峰坝	山峰	包括新圩、涂屋、围子、范屋、胡屋、李梓坝、岭脚下、温屋、林屋等村。明末，范氏从福建武平迁入，曾氏、涂氏等同期相继迁入	杂居

续表

片村名称	所属大队	概 况	聚落类型
9. 麻园坝	潭头	包括大树下、李屋、周屋、岗坂下、上下刘屋、石古内（又书写为石库内、石古里）、江子脑、窑前、罗芽岔等村。清代，刘氏从本乡石岩潭迁入，后有张、李二姓人居	杂居
10. 固院村 ^①	新兴、河坑、张军、龙口、安和、安排、潭头、岗中、下潭、红丰等大队	地势平坦，人烟集中，系全县最大的村庄。传说先有沈、韩、古、莫、蔡、田、聂等姓在此立基建村。东晋和隋唐时于都先后两次在此立县。明清时期大概有五十多个宗族姓氏先后迁入此地开基建村	杂居
11. 中坊	排脑	包括年秀坪、禾塘内等村，居曾、肖、郭、易等姓氏，曾松山于清初从本乡青树下迁入，已16代	杂居
12. 龙口	龙口、张军	包括祠堂里、上屋等村，居王、刘、赖、张、肖、彭、邱、李等姓，王氏居多，于元朝从本县仙下乱石迁入，刘氏同期从秦和迁入	杂居

续表

片村名称	所属大队	概 况	聚落类型
13. 下村	联星	包括上下山崎、羊子墩、老屋场、下屋场、水口等村,居易、邓、刘、毛、谭等姓。易氏于明代从于都城东门易屋迁入,毛氏于明代从乐安迁入,谭氏于宋代从本乡瓦松迁入	杂居
14. 上蕉	上蕉	包括上村、下村 ^② ,居易、谭、毛、刘等姓。明末,易氏从于都城东门迁入	杂居
15. 牛皮 · 堑	生龙	包括河背、湾背、小排、弓桥里、赖屋、许屋、上屋等村,居赖、陈、邱、张、刘等姓。赖氏最早建村,于宋代从福建长汀迁入,明末清初,陈、邱相继迁入	杂居
16. 半径	磊石	包括半径、暗山、夫竹甲、老屋场、新屋坪等村,居肖、尹、郭、吴、刘等姓。清代,肖氏从本县寒信龙颈坝迁入	杂居
17. 西坑	磊石	包括石阶下、枫树坪、东丰等村。尹氏于清代从本县采丰尧口迁入,后有华氏、康氏相继入居	杂居
18. 磊石	磊石	包括樟木山、大面上、东水湾等村。康氏居多,于清中从信丰迁入,尹氏相继从采丰迁入	杂居

续表

片村名称	所属大队	概 况	聚落类型
19. 东坑	磊石	包括庙前、新屋、立树墩、黄土坎、燕禾、营里、东坑安等村。康氏居多,于清代从采丰迁入,刘氏同时同地相继入居	杂居

资料来源:于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于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年,第213-234页。

说明:(1)这里指狭义上的“固院村”;广义上的“固院”包括固院村、麻园坝、龙口、中坊等四个片村。(2)事实上,上村、下村又成为相对独立的片村。

于都县位于赣南中北部,贡江的中游,早在汉代已建立县治。梓山则位于于都县的中部。从《于都县梓山公社地名图》^①可见,梓山境内东南属半山区,西北属丘陵,贡江自东向西横贯全境,两岸有许多块大大小小的冲积平原,并接纳了数条大小不一的支流。梓山境内大部分村庄分布在贡江及其支流的沿岸平原及丘陵地带。如《于都县梓山公社地名图》及表10-11所示,这些村庄又具有局部集中分布的趋势,于是形成近二十个大大小小的片村聚落,其中大部分的片村都是由好几个不同姓氏的村庄构成,形成杂居的格局。又据载,这些姓氏的来源以及他们迁入的时间都各不相同,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上述片村聚落内部多元的社会构成和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上述片村聚落中,位于公社西南面六公里大墩中的固院村是于都县最大的片村,其杂居的特征最为显著。这里地处贡江南岸,地势平坦,村庄密集,人烟集中,自然条件优越,是于都县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东晋和唐前期,于都县治先后两次设在此地,至今还保留着原来的城隍庙。其范围包括新兴、河坑、张军、龙口、安

^① 于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于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年,第211页。

和、排脑、潭头、岗脑、中心、下潭、红丰等大队及其所属自然村，素有“固院三村”之称，即龙口以出至河坑为中村，从年秀坪以下至排脑、岗脑、安和、潭头、操所里为中村，从白竹塘以出到田心、下张屋至下潭老圩脑为外村。如表 10-11 所示，固院片村聚落包含 89 个自然村，它们分别由 56 个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姓氏所建立，其中石岸潭刘氏、下潭曾氏、上屋王氏以及下张屋肖氏等姓氏建立有多个村庄并表现出相对聚居的格局，此外大部分姓氏几乎就是一姓一村。由错落在贡江南岸及两条支流夹贯其间的固院平坝上的这些姓氏村庄构成的杂居聚落格局，进一步说明了于都县梓山境内聚落形态和空间格局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表 10-11 于都县梓山公社固院片村杂居聚落构成

村庄名称	建村姓氏	建村时间	姓氏来源	户数	口数
垄子脑	杨	清	禾丰杨梅坑	6	45
石溪角	周	明末	西郊白口	27	163
良坝	同上	清	西郊白口	27	140
岭脑	周	明末	泰和	52	285
丹水坑	同上	明末	岭脑	51	300
石岸潭	刘	明	宁都竹坝	122	790
窑前	同上	清	石岸潭	34	221
下刘屋	同上	清	石岸潭	?	?
江子脑	同上	清	窑前	13	62
窑灶背	刘	清	固院麻园坝	38	194
土墙背	刘	元	万安	25	115
老圩脑	刘	清	牙头岭	16	85
石子排	刘	1945 年	上坝	1	3
鸭婆口	刘	明末	万安	23	117

续表

村庄名称	建村姓氏	建村时间	姓氏来源	户数	口数
良下湾	许	明末	会昌		
	陈	清	铁山垄		
黄竹脑	李	清	塔脚下	21	121
罗芽岔	李	清	岗坂下	19	123
白竹隈	李	清初	县城北门 李屋	107	547
谢屋场	同上	明末	白竹隈	10	52
塔脚下	吴	明末	福建武平	61	372
河坑径	同上	明	福建武平	28	150
山塘坑	吴	清初	瑞金	19	124
果龙	丁	清	利村新陂	34	183
桐子坑	曾	清	老虎脑	5	30
长山子	曾	明末	禾丰	24	124
田心	同上	清中	长山子		
乱石陂	曾	1940 年	操所里	6	40
下潭	曾	明末	石古里	50	271
陈屋	同上	明末	石古里	26	134
西片	同上	明末	石古里	63	398
钟屋	同上	明末	石古里	?	?
坝内	同上	明末	石古里	46	234
禾塘内	同上	清初	坝内	26	123
青树下	同上	清初	石古里	17	103
上排子	同上	清初	石古里	36	193
下排子	同上	清初	石古里	43	204
岭下	同上	清末	坝内	32	186
撞木岭	曾	清末	岭子背	10	70

续表

村庄名称	建村姓氏	建村时间	姓氏来源	户数	口数
学堂下	易	清	仙下	23	122
潭坎脑	易	清末	新易屋	14	77
高头脑	袁	明	瑞金万田	35	200
乌柏树下	同上	清	瑞金万田	5	36
西坑	袁	清中	西郊大屋	29	188
上高陂	袁	1930年	西郊河田	41	228
下张屋	肖	明	泰和	31	173
新下张屋	同上	明	泰和	16	90
寺角	同上	清	下张屋	65	243
螺田	同上	1940年	下张屋	2	13
大庄	肖	清	后背肖屋	40	219
象牙潭	邱	清	高陂龙山	38	200
中家田	罗	清	泰和	24	131
园家山	梁	清中	禾丰	5	32
梭丘	高	清	泰和	40	222
段屋	段	清	车溪段屋	39	212
交夏塘	冯	明中	广东	13	76
寨脚下	欧阳	明末	张军圳背	16	84
圳背	同上	清末	欧阳屋	13	72
高陂	黄	明	宁都水西	48	274
蔡屋	蔡	唐末	浙江萧山	35	205
戴箕陂	同上	明末	上蔡屋	22	128
白竹坪	严	清末	车溪严坑	1	5
合计: 89村	56族				

资料来源: 于都县地名办公室编印: 《江西省于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5年, 第213~234页。

续表

村庄名称	建村姓氏	建村时间	姓氏来源	户数	口数
大树下	同上	清	岭子背	41	214
大营里	张	清初	松树下	17	81
石库内	张	清	下潭张屋	17	112
岭子脑	张	清末	寺角	30	166
张屋	张	清	泰和	52	289
松树下	同上	咸丰	张军张屋	15	97
木梓岭下	谢	清初	排脑	25	110
荷树垄	谢	清中	社背垄	78	391
洋蓝寨	谢	清初	石桥头	19	70
大路排	王	1948年	桥子下	3	27
牛嘴岭下	王	1940年	梓山大王屋	7	41
上屋	王	明	仙下乱石	50	264
祠堂里	同上	明	上屋	30	174
塘子背	同上	至今12代	祠堂里	24	117
岭子背	同上	至今11代	祠堂里	20	113
对门	同上	至今6代	祠堂里	10	60
塘泥坑	同上	至今6代	祠堂里	7	60
马屎屋	同上	至今5代	祠堂里	5	35
坳背	同上	清	龙口	3	19
新何屋	何	明	泰和	47	267
操所里	同上	明	泰和	34	199
黄沙井	郭	清	梓山黄牛出栏	16	102
黄檀树下	郭	清初	西郊郭屋寨	56	311
年秀坪	郭	清中	泰和	25	161
罗易屋	易	清中	四川	32	189
枫树下	易	清中	利村水境	13	61
岗脑	易	明末	朱田流坑	58	349

其实,地名志中关于“建村姓氏及其来源”和“建村时间”的内容不一定是对过去移民移居过程的真实记录,而是当地人对村庄历史或来历解释的结果,它反映的是当地人在具体社区关系格局中的一种历史归属或社会认同。土地革命前赣南乡村聚落形态和空间格局的多元复杂性即包含着乡村居民在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下的社会认同或社会分类的基本特征。

(一) 方言及祖籍地的认同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方言及祖籍地通常是划分聚落群体的一个重要标志或特征。^①在土地革命前赣南乡村社会中,方言及祖籍地的认同对于聚落形态和空间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目前,一般的看法是赣南的方言以客家话为主,除了赣州市和信丰县城及城郊一些村庄说的是西南官话外,赣南大部分城乡地区都是说客家话。颜森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方言调查,又把赣南客家话划分为东、西两片:东片包括兴国、宁都、石城、瑞金、会昌、寻乌、安远、定南、龙南、全南、信丰十一个县;西片包括大余、崇义、上犹、南康、赣县、于都六个县。东片有人说他们自己的方言是地道的客家话,而西片受赣语影响较多,客家话的影响就“好像一阵大水一样,(从东边)冲到西边,已成强弩之末”^②。另外,早在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就在访问而非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客家方言为根据,把赣南17个县划分为纯客县和非纯客县,其中纯客县包括寻乌、安远、定南、龙南、虔南(即全南)、信

^① 美国学者科恩关于中国东南地区方言差别与社会分类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方言的差别对社会群体的划分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它可以影响广泛的社会关系,并成为塑造某一社会群体成型的主要力量。参见[美]迈伦·L·科恩《客家,“客籍居民”》:方言是中国东南地区聚居繁衍的一个可变因素,《太平洋国际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6-349页。在清代台湾汉人移民地区,方言及祖籍地对于社会群体的分类以及相互关系的影响更加显著。参见施添福《清代在台汉人的祖籍分布和原乡生活方式》(地理研究丛书第十五号),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1987年印行。

^② 颜森:《江西方言的分区(稿)》,《方言》1986年第1期,第20页。

综合以上分析,土地革命前夕赣南乡村地区的聚落形态大致有聚居聚落、散居村落及杂居聚落三种基本类型。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及各种历史因素的制约,这三种聚落形态在赣南各地的具体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别。大致在地理位置开阔、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开发较早、历史过程相对复杂曲折的赣南中北部诸县,这三种类型的聚落形态往往同时并存于一个较大的社区空间中,形成比较多元复杂的聚落格局,如于都县北部的赖村乡、宁都县南部的田埠乡、于都县中部的梓山乡境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三种聚落形态。在赣南南部山区,地理位置相对狭小、闭塞,加上明代以来动荡的历史环境,这里的居民往往聚族自保,于是其聚落形态普遍的是镶嵌在狭长河谷地带或山间盆地里的呈点状的聚居聚落,如分布在龙南县南亨河沿岸狭长地带的大小小小的聚居聚落。在赣南西部山区以及中北部的一些地区,由于明末清初闽粤移民大面积的安插或移垦定居,聚落形态主要表现为闽粤移民村庄的密集分布格局,如在寻县营前一带密集分布的闽粤移民村落。总的说来,土地革命前赣南乡村地区的聚落形态和空间格局十分多元、复杂。

二、社会认同的基本特征

以上根据地名志所了解到的土地革命前赣南乡村聚落形态及空间格局,是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其间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内涵。过去,人们往往把地名志中关于“建村姓氏来源”和“建村时间”的内容作为重建移民移居历史和地区开发过程的直接依据^①,也就是说,根据这一着眼于移民史的解释,上述乡村聚落格局的形成纯粹是移民移居历史的自然结果。

^①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第19-40页。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196页。万芳珍:《江西客家人迁原由与分布》,《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第55-62页。

方言及具有不同来历的人群。据邬荣治等人编纂的民国《南康县志》记载：

(南康) 全县语言复杂, 大概可分四种。一、本地话, 南康土音也, 县城及其附郭, 龙回, 章水沿岸(的)贤女埠、江水南、羊坝、窑边、珠边、洋江口、邱边、黎边、村头、江坝、斜角、湖头、小坝等, 犹水沿岸(的)蒙河、马齐坝、幸村、石塘, 塘江钟村、卢村、横冈头、伍村、凤冈朱村等属之。二、潭口语, 如广东兴宁语而少变, 蔓延全县, 操此语者其先本兴宁人, 清初徙此占籍也。潭口墟周围数十里, 殆尽操此语, 次则凤冈以北诸村。三、六区语, 第六区及赤土周围朱坊埠以西皆此系。四、河源语, 惟镜坝、鹅岭、石鼓陇与塘江附近之, 操此语者其先则广东河源县人而徙此者也。^①

从以上记载可知, 在南康县, 本地话即土著方言, 主要分布在上犹江和章江(即芙蓉江)沿岸一带的村落, 潭口语(即广东兴宁语)与河源语这两种广东移民方言主要分布在上犹江和章江附近以及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一些村落(如凤冈以北诸村)^②, 而所谓的“六区语”则主要分布在赤土河与朱坊河(属民国时期行政区划中的第六区)流域一带的村落。这些不同的方言地带聚居着具有不同来历的社会群体, 如根据民国《南康县志》记载, 清以前迁居南康的早期居民, 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优越的章江(即芙蓉江)和上犹江沿岸一带, 而清末清初以来迁来的外地移民(以广东移民为主)则大多分布在离大河较远的地带:

① 民国《南康县志》卷六《社会·风俗》, 邱自芸、邬荣治、郭选英纂,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铅印本。

② 在赣南许多地方(包括笔者家乡信丰县在内), 当地早期土著居民通常称清初以来移居这里的广东移民和福建移民为“广佬”、“福建佬”, 往往也把这些移民的方言称为“广佬话”、“福建话”。

丰、南康、大庾、崇义、上犹十县, 非纯客县包括兴国、于都、会昌、宁都、石城、瑞金等七县。^① 颜森与罗香林关于赣南客家方言区或“纯客”与“非纯客”的划分,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赣南社会文化的内部差异性, 但在总体上仍然强调赣南作为“客家地区”的同质性。

实际上, 土地革命前及整个民国时期, 赣南各地的方言构成与分布十分复杂。据1926年南康籍方言学家邬荣治的调查研究, 当时赣南的方言构成及分布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在赣州及其城郊一带, 主要是说官话: “赣州官音, 相传由明代王守仁传授, 与浙江官话、四川官话相同, 或可代表南方官音。在赣县操官音, 惟城内及附郭而已。乡间操赣南土音者, 仍居多数。”(2) “于都、石城音异各县, 其故或因于都建县甚古; 或受古音异族方音之变化。石城位赣南道属之东北隅, 赣官音或是由北而南, 赣土音或是由南而北(赣南民族由广东转徙而来者甚多), 石城交通不便, 故略异也。”(3) “赣南土音与广东嘉应州(今改称梅县)音最相近。南康客籍, 凡由嘉应迁徙来者, 皆操是音。其势力之大, 不但赣南属各县, 人人领解, 即自遂川、万安, 以及修水、武宁、南昌乡间, 皆觉很相近。”(4) “南康话大别可分二种: 一、本地声, 二、广老声。(俗语)广老声即所称赣南土音, 由嘉应迁来客籍, 人口占南康多数。本地声, 即南康土著, 现城区操是音, 大致与国音同。……南康建邑甚古, 其音与京音相同, 实研究国音之好材料也。”^② 由此可见, 赣南的方言虽然大体上可以分为“官音”与“土音”(即所谓的“客家话”)两大种, 但其实各地的方言仍有比较大的差别, 如于都、石城及南康等县的方言均表现出差异性和多元性。

这种方言构成与分布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在各县内部的乡村聚落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不同方言的社会群体往往在聚落格局和空间分布上互为区分。如在南康县, 在不同的乡村聚落, 分布着不同的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1933年),台北南天书局1992年版。

② 邬荣治:《赣南方音考》,江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6年。

全县共数百姓，聚族而居，多赣县、信丰、遂川、兴宁、河源客籍。县城姓、美、高、蔡、李五姓与塘江卢姓住最久，但皆唐宋时迁来，亦非土著也。大抵清以前迁来者多分布芙蓉江（即章江）、上犹江两岸，后此者多在深山也。^①

可见，人群及聚居聚落的区分体现在方言以及祖籍来源的差别上，也就是说，方言及祖籍来源成为乡村居民之间认同与分类的一个重要因素。

清咸丰年间，这些不同的方言聚落及认同群体之间曾经发生过剧烈的冲突与对抗。当时，太平军攻入赣南，聚居在潭口一带、说广东兴宁语的居民乘机向县城及湘江（一作塘江）等说本地话的土著聚居区发动进攻。在湘江，当地土著大族卢氏与潭口“土匪”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最后随同官兵一起将“贼众”剿平，事见卢氏族谱记载：

当咸丰丙辰（六年，1856年）之春，发进攻陷吉郡，南赣震动。各处土匪遂在潭口墟揭竿起事，围扑县城，并勾结发逆入境，以为久踞之计。我族奉文团练，在祠设局，隔河而营，相持者数月，距入冬，河水浅涸，贼首督大队分上下游涉水来扑，我兵寡不敌众，且战且退，贼亦紧追不舍，所过辄焚掠，大祠遂为所毁。越数日，仍复招集散亡，设局土围岭之糖栈，随同官兵进剿，至次年正月元夕节，始将潭口墟老巢攻破，贼众悉宵，县境遂平。^②

① 民国《南康县志》卷六《社会·风俗》，邱自芸、郭荣治、郭选英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铅印本。

② 《南康唐江卢氏合修族谱序》（光绪二十四年，四川叙州府宜宾县知县十世孙鼎智），《赣南卢氏族谱》第二册，卢桂山等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铅印本。

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不同的方言及祖籍地认同群体和聚落之间，在具体社区生活中存在着竞争乃至对抗的紧张关系，这往往又反过来强化了双方之间的分类和各自内部的认同，从而使得乡村地区的聚落格局和社区关系更加复杂。

（二）户籍归属与认同

户籍的归属与认同对土地革命前赣南乡村地区的聚落格局和社区关系亦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在明末清初闽粤移民集中分布的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如在清初，集聚在南康县潭口一带的广东兴宁人，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占据当地户籍为契机而与其他人群区分开来，民国《南康县志》指出：“潭口贸易略逊塘江，清初（广东）兴宁人徙来，占籍者众，人坚毅刚武，任气尚勇。”^①

清初闽粤移民以户籍自为归类，是造成后来赣南地区土客分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清初上犹县营前一带，大量的广东流民被政府安插或招徕垦荒。当时地方政府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稳定动荡之后的赋税收入，所以尽量将这些广东垦民分解编入残缺的土著里甲户籍中。可是，这些广东垦民却自为一类，集聚一处，不与土著相融。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上犹县知县陈延缙即指出：

（上犹营前一带）连遭粤叛，屠掠惨不胜书，查先后呈乞而未者，举皆广人，意鲜怀故，不过虎视眈眈。夫先有旧插百数之俸，再加陆续新归之众，羽翼益繁，朋谋亦便，事未可定。……奉文同编入甲，原属防闲至计，奈方以类聚，粤人附粤，詎肯暂离，如此坑墟变绝，联络艰难，虽设保正，鞭长不及。^②

① 民国《南康县志》卷六《社会·风俗》，邱自芸、郭荣治、郭选英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铅印本。

② 康熙《上犹县志》卷三十一《杂记·文案》，（清）章振尊纂，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41页。

广东垦民的这一集聚定居过程，深刻改变了当地的聚落格局。如前所述，广东移民村庄的密集分布和土著村庄的挤压萎缩构成营前地区聚落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对这一带的民情风俗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情如民国《上犹县志》所指出：

二区（即指营前片）居民，除朱陈蔡曾一部分为土著外，其余各姓多在明末清初时由粤迁居于此者，民性诚朴，男妇皆能刻苦耐劳，努力操作，尤其是尊卑长幼男女亲疏礼教森严，惟囿於迷信过深，如选择风水、迎身拜佛，种种积习，牢不可破。……此种风俗习惯大概与广东兴宁梅县相差无几。^①

在兴国县东北部的衣锦乡一带，闽粤垦民也在户籍归属上自成一类。清初大量的闽粤流寓聚居在兴国县东北山区，他们一开始并没有人籍当地，而且相对独立聚居在一处，不与土著杂居相融。经过后来的顶充入籍，这些闽粤流寓比邻错居，形成与土著相隔离的村落密集分布格局。^②

南康县潭口、上犹县营前以及兴国县衣锦乡等地闽粤移民垦户聚居与人籍的事例表明，外来“客佃”与土著居民之间在聚落格局和空间分布上的分隔隐含着双方不同的户籍归属与认同。这一社会分类成为后来赣南乡村地区土客矛盾冲突的社会根源。

（三）同姓归宗与祖先认同

乡村宗族内部的整合认同与外部的分类对抗，对于土地革命前赣南乡村聚落格局的形成和社区关系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在清代乡族之间资源竞争激烈和矛盾关系紧张及乡族械斗盛行的情形下，人们对于宗族认同和整合的需要特别强烈，宗族的整合与认同

① 民国《上犹县志》，上犹县县志编辑局编，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稿本。

② 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历史系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1～105页。

也已经远远超出了具有真实血缘关系的宗族之间的联合，许多宗族尤其是那些势力孤立的小户以及初来乍到的外来移民，往往通过同姓认祖归宗甚至是改姓附宗的途径与其他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宗族相结合，以适应乡族竞争的生存环境。如在闽粤佃户集中分布的宁都县下乡，这种情形比较典型。乾隆六年《宁都县志》的编者指出：

上乡清泰、太平多土著巨族，客户一二，习而安之。怀德暨下乡安福，虽有客居，而犹鲜携贰。惟仁义、平阳两乡，闽广寄寓居其半，久隶宁籍者无论矣，有视为浮家，来去无定，或一姓占两籍，或他宗冒同祖，甚至易姓附宗，混称一家者。按厥所由，欲以强族争胜。^①

在清代户籍由宗族掌握和控制的制度背景下^②，同姓归宗或易姓附宗，也是外来移民获得当地户籍及定居权的一条重要途径。^③由于户籍涉及地方权益的竞争（尤其是科举名额的竞争），闽粤移民在赣南获取户籍的过程中，常常遭到土著的排斥和阻挠。^④在此情形下，闽粤移民则通过各种变通手段去获取户籍。如在上述上犹县营前一带，就有许多广东流移民以同宗名义或改名换姓的办法，

① 乾隆《宁都县志》卷一《舆地》，（清）郑昌龄、梅廷驯纂，乾隆六年（1741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0页。

②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请参见刘志伟《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3期，第62～73页；郑振满《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38～44页。

③ 据郑锐达的研究，在清代江西另一个移民地区袁州府，外来闽粤“棚民”也是通过同姓归宗的途径以取得当地户籍的，并得以在当地社会中不断地冒升。参见郑锐达《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 参见拙文《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与已拥有户籍的、先来的广东移民结成宗族，以获得定居和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可是，在当时土著居民及地方政府官员看来，这完全属于非法的冒籍报考，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上犹县知县陈某指出：

看得入籍应试，普天有之，必核其虚冒，严其诡秘，名器不致侥幸，而匪类无从窥觐也。单县蕞尔荒陬，叠因寇变，土著百姓徙亡过半，田土悉多荒芜，招佃垦辟，胡子田等移居犹境，陆续营产置业，於康熙十二年起户牛田又七甲当差。康熙十三年即乘逆叛而粤佃附和肆毒，然其中亦有贤愚之不一也。兹当奉文岁试，粤民何永龄等二十余人连名呈请收考。虽人材随地可兴，而考试以籍为定。胡子田一户称已入籍，呈请与考，庶亦近理，然亦必须与土著结婚连姻，怡情释怨，里甲得以认识，生童可以互保，习熟同群，彼此相安。庸有面不相识，突如其来，或借以同宗之名，自或借寄升斗之田粮，依葛附藤，呼朋引类，以犹邑有限之生童，何当全粤无穷之冒滥？^①

尽管地方政府出于治安的考虑，尽力把这些闽粤流移遣回原籍，但仍有大量的闽粤移民通过同姓归宗或改名换姓的办法在上犹定居了下来。如上犹县土著居民吴大兴愤懑指出：“蒙前道府各宪虑逆贼叵测难防，屡详抚督董、佟两宪遣散安插回籍，不许令其在聚犹地。诟恶改名换姓，阳散阴伏，仍踞犹邑，还种祸根，民冤莫伸。”^②

同姓归宗或易姓附宗的结果，除了使外来移民的户籍地位和社身份发生根本改变之外，也使移民原先真实的宗族来历有所掩盖，也就是说，外来移民在新移居地经过同姓或易姓附宗之

① 《残民叙陈叠受叛害原白》，乾隆《上犹县志》卷二十《艺文志》，（清）贾文石、蔡泰均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刻本。

② 《残民叙陈叠受叛害原白》，乾隆《上犹县志》卷二十《艺文志》。

后，与当地宗族形成新的宗族认同关系或新的世系来历及谱系结构。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20世纪80年代地名志中的“建村姓氏及其来历”和“建村时间”也就不能完全看成是一个移民移居过程的真实结果，而很大程度上是发生在移居过程中的宗族认同与文化整合的结果。可见，在由地名志所反映出来的土地革命前赣南乡村地区的聚落格局中，隐含着过去宗族认同与整合的历史过程。

清中叶以来，赣南乡村地区出现了普遍的同姓联宗活动，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宗族认同和整合的范围更加广泛。^①例如，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至民国时期，上犹县大雷隘寨下李氏联合本县及周边地区的其他李姓进行过数次联修族谱，联修的范围逐次扩大，各支李姓之间通过祖先的追溯和新谱系的建构而获得广泛的参与认同。^②又如明末清初从广东迁居在兴国县境内、原先毫无关联的数支张氏家族，相互间通过不断联修族谱而逐步拥有了共同的祖先和同一的世系。^③像这样的同姓联宗往往得以强化相互间的宗族认同和社会联系，如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明末清初以来的、大多是从广东地区分散迁居在上犹县及周边地区的62支张姓家族进行了族谱联修，尽管各族之间具体的迁居过程各不相同，相互间也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但这次联修族谱使他们获得了共同的祖先，他们都自认是远祖化孙公的子孙，从而连为一体。其大致情形如当时主持修谱的上犹县营前雷公陂张氏九为公派下九世孙张莱庭所述：

清初三藩叛变，蹂躏西南各省，而闽粤之民多流离于邻疆。及今考之赣水东西之客民，十九皆闽粤籍人也。我张氏派

① 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历史系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4~162页。

② 上犹《李氏六修族谱》，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刻本，上犹县营前镇营前街李舒传先生藏。

③ 兴国《张氏十一修族谱》，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刻本，江西省于都县档案馆藏。

行于曲江，而繁殖于闽南，迨夫康熙初叶亦避地而北迁，若遂川，若南康，若上犹，若崇义，无地无张氏聚居于其间，或群数十人而族处焉，或群数百人而族处焉，或群数千人万人而族处焉。而稽其所出，无非化孙公之苗裔也。……自清初以迄民国，二百六十七年间，从无汇修家乘之盛举，同源别派，相儒非遥，或自粤而来，或从闽而徙，开基于斯，俱不过十余世而已。……在局诸执事人员倡议购置店房一所，以为建筑总祠之预备。倘此总祠克底于成，我张氏尤能联络一气矣，是在吾宗人实图利之。夫吾张氏自清初北徙以来，历年虽久，而各自为宗，情意不属，几等散沙，实无可讳。乃者已汇修其家乘矣，尤协力以建总祠，精诚团结，与时俱进。^①

同姓归宗或易姓附宗及同姓联宗，都反映了土地革命前赣南乡村社会普遍的宗族认同与整合，同时也对乡村聚落格局和社区关系产生深远的历史文化影响，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土地革命前赣南严重的地方宗族主义。^②

三、地方政治派系

如上所述，在土地革命前夕的赣南乡村地区，聚落形态和空间格局以及人群的分类十分多元复杂，如大村庄与小村庄之间、聚居聚落与散居聚落之间、平坝聚落与山地聚落之间、上游聚落与下游聚落之间，以及不同的方言群体之间、土客之间、不同姓氏宗族之间，等等，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为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客界限问题和地方主义问题（即姓氏界限和宗族主义的

① 《汇修家乘叙》（民国二十六年，聘任县立、私立高级小学校长，上犹县营前雷公陂张氏九为公九世嗣孙秉庭），上犹《张氏汇修族谱》，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刻本。

② 参见拙文《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问题)。

根据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当时的调查报告或后来的回忆录以及一些文史资料可知，在赣南乡村地区，土客界限和土客矛盾十分突出。同时，姓氏界限和以家族势力为基础的“地方宗族主义”问题也相当严重。毛泽东在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指出，寻乌县的姓氏界限观念十分严重，当地的山林都被各姓控制，不容外姓侵渔：“通常一姓的山（一姓住在一村），都管在公堂（指宗族祠产）之手，周围五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①具有严格姓氏界限的宗族之间，往往在地方利益争夺中发生武装对立与冲突。据曾经参加1928年5月兴国农民暴动的兴国人李挺回忆，这种情况在兴国县东北部的崇贤乡十分突出：

在（兴国县东北部的）崇贤，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族长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常常挑唆和发起氏族之间的仇恨、械斗。……（崇贤高初两级小学）学生多系本乡地富子弟，学生中形成两派斗争，即“山地派”与“平地派”的斗争。这些斗争常常是以山区、平地出身贫寒、学品兼优的学生联合起来，使大地主纨绔子弟陷于孤立而告终。^②

上述表明，不仅不同宗族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而且居住在山地和居住在平坝的居民及其子弟之间也形成派系斗争，土地革命前夕赣南乡村地区的族群矛盾可谓错综复杂。

其实，根据毛泽东在1928年《井冈山斗争》一文的叙述，在当时赣南的周边地区，如包括井冈山地区在内的整个江西边界地

①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81页。

② 李挺：《崇贤农民暴动》，《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1928年5月在谢云龙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兴国县东北部的崇贤农民发动了武装暴动。

区,地方(宗族)主义的问题和土客界限问题都十分严重。在这些地区,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同时,这些地区的“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①土地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湘赣边特委副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陈正人在回忆文章中对井冈山地区的土客矛盾和地方主义问题作了更具体的分析: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在封建经济基础由地主阶级搞起来的。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土、客籍矛盾在宁冈特别严重。那时土籍和客籍学生不能进同一个学校念书。客籍人被土籍豪绅封建势力压迫,把客籍人看作是外来户,低人一等。土客籍的矛盾,本质是地主阶级和客籍农民之间的矛盾,但却把阶级矛盾掩盖着,不利于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地方主义也是封建经济的反映。有了地方主义,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这是危险的,只有利于阶级敌人。……土客籍矛盾的危害很大,敌人常常利用这个矛盾挑起械斗,破坏革命势力。……共产党员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能分县界、区界、乡界。……在实践中,由于闹土客籍对立,闹地方主义,在敌人进攻下吃了亏,得了教训,才真正容易明白为什么不能搞地方主义,不

^①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69、74页。

能搞土客籍对立。主席很注意既要土籍革命干部,也要培养客籍革命干部。在客籍人多、土籍人少的地方,要培养客籍人来当。建立、发展党组织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注意在客籍中发展雇农的党员。在经济上也要注意土客籍群众一律平等,如分田时,不能分坏田给客籍农民。总之,要强调土客籍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都平等。^①

土客界限问题尤其是更加普遍的地方宗族主义问题,又常常具体表现为地方势力集团及地方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如在土地革命前夕的于都县,全县大致分成两个地方政治派系,即昌村派和雩水派。这两个地方派系操纵于都县的地方政治,在地方利益竞争中既对立冲突又妥协合作。曾经于1928年3月先后在于都县南部和北部领导农民暴动的于都籍共产党人丘侗(1903—1980年)对这两个政治派系的社会基础及斗争状况作了详细回忆:

全县(于都县)的土豪劣绅,当时分成了昌村与雩水两派对峙,两派之间既有勾结又有倾轧。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左右于都全县的反动政权。昌村派代表了农村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势力,他们以北乡的银坑、马鞍山、赖村、葛坳、水头,东乡的固院、梓山,南乡的禾丰、小溪等村乡为基础,这些乡村都是聚族而居的,宗族观念高于一切,他们受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统治,本族的土豪劣绅就像土皇帝,操着生杀予夺之权。雩水派的势力范围在县城和西南两乡,这两个乡中小地主居多,除禾丰、新陂、小溪等处有些较大氏族聚族而居外,其他大部分村庄是杂姓散居,人少姓小,其中有些中小地主兼营工商业。两派竞相勾结伪县政府,把持地方政治,分赃地方利益,包揽河讼,武断乡曲,鱼肉乡民,无恶不作。凡是想在

^① 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51页。陈正人(1907—1972年),江西省遂川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地方上混饭吃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于昌村派就得拜倒零水派下，否则就无进身之阶。^①

由上可见，昌村派和零水派分别是由不同的姓氏宗族联合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政治派系的社会基础是不同乡村的宗族势力。这意味着当时于都县的社会矛盾已经超越了村落范围，而在更大的范围及更广泛的社会人群之间展开。这种地方派系斗争在土地革命前夕的赣南各地十分普遍，如在大余县，清末民初时出现了分别以城区士绅和乡区士绅为首组织的“忠良祠”与“众志局”两个地方派系，随后又出现了“三师”与“四中”、“四大金刚”与“十八罗汉”等地方派系，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错综复杂。^②

除了上述复杂的各种族群之间的矛盾，地处边界地区的赣南乡村社会还广泛存在生态的与阶级的矛盾问题。明清以来稻作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仍然没有多大变化，乡民生计相当贫弱。根据毛泽东在寻乌、兴国等县的调查，一年耕种收获不够吃的贫农家庭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他们通常要借债才能勉强过活；而农村百分之三四十的田地集中在不到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户主家庭中。^③ 这一方面反映了赣南乡村经济的贫弱；另一方面又说明确明农村的土地问题和阶级分化十分严重。

四、结 语

以上分析表明，经过明清时期长期的历史演变，至土地革命前夕，赣南乡村地区的聚落形态和空间格局十分复杂多元，聚居聚

^① 丘偶：《回忆于都暴动》，《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② 王朝栋等：《建国前大余的派系斗争》，《大余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71页。

^③ 参见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81页；《兴国调查》（1930年10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251页。

落、散居聚落及杂居聚落等各种类型的聚落往往交错分布在一些地理位置开阔、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开发较早的河谷平原地带，或点状分布在河流的上下游及山间盆地的中心与边沿，形成大村庄与小村庄、聚居聚落与散居聚落、平坝聚落与山地聚落、上游聚落与下游聚落同时并存的空间格局。这多元的聚落格局反映了不同人群的分类。由于经历了不同的移居发展过程和拥有不同的方言及户籍等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各个聚落人群具有不同的社会认同，以致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了不同的人群划分，如大姓与小姓、大族与小户、本地的土著与外来的客户以及各方言群体。在具体的社区生活及地方政治生活中，各个聚落及人群之间的矛盾关系错综复杂，并集中体现为土客界限问题和地方宗族主义问题以及地方政治派系斗争。在随后的土地革命过程中，这几方面的社会矛盾问题广泛地卷入了进来，深刻地制约和规定着土地革命的发展进程。^①

^① 参见饶伟新《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